

古代语言文字学

GUandaiYUYANWENZIXUE

敏春芳 著

古汉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代语言文字学

GUDAIYUYANWENZIXUE

敏春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语言文字学/敏春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161-2756-8

I. ①古… II. ①敏… III. ①古汉语—文字学 IV. ①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80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王 曦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兰州大学“985”工程资助项目

目 录

第一章 文字学	(1)
第一节 文字学简史	(1)
第二节 汉字的起源和构形	(24)
第三节 《说文解字》研究	(72)
第二章 音韵学	(100)
第一节 音韵学基本功用	(100)
第二节 《广韵》音系(中古音系)	(121)
第三节 中古声韵调研究	(141)
第四节 上古声韵调研究	(176)
第三章 训诂学	(213)
第一节 训诂及训诂学	(213)
第二节 训诂学家及训诂著作	(217)
第三节 随文释义的注疏体裁	(257)
第四节 训释词义的方法	(262)
附录一 词汇研究的方法	(293)
附录二 古汉语同义词辨析	(297)
参考文献	(310)

第一章 文字学

第一节 文字学简史

文字是记录语言书写形式的一种符号系统，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伟大的汉民族祖先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系统——汉字。汉字起源很早，有人追溯到夏代。就甲骨文说，已经有 3300 多年的历史了。甲骨文已是很成熟的文字，而并非原始文字，再追溯千年，并非臆测，也就是说，汉字约产生在 4000 年之前。

一 历史上对汉字的称谓

先秦以前，对汉字的称谓较多，大致有四种：

（一）称“文”

《书·序》：“由是文籍生焉。”陆德明《释文》：“文，字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杜预并《注》：“文，字也。”《论语·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邢昺《疏》：“文，字也。”《孟子·万章上》：“不以文害辞。”朱熹《四书集注》：“文，字也。”

“文”，《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甲骨文作（合 4611 反）、（合 4889）、（合 27695）等，象人正立之形，胸部有纹饰（或省）。金文里错画之形逐渐讹变为接近“心”字之形，作（保卣）、（旂鼎）等。故“文”当为“纹身”之“纹”的本字。《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矣。”文身乃先民习俗。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即刻画之文饰也……文训错画，

2 古代语言文字学

引申之义也。”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较多，而较为可信的一种说法是汉字起源于上古时代的图画记事，而图画记事所用符号标记正与人体胸部“错画之文饰”具有相似之形，如图1-1、图1-2：



图1-1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号



图1-2 青海月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陶器上的符号

部分早期汉字又与这些符号有相近之处，甚至完全相同，或许这些符号真是部分早期汉字的雏形，所以，将汉字称为“文”也合情合理。顾炎武《日知录》：“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

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

（二）称“名”

《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又《周礼·大行人》：“九岁属瞽史谕书名。”郑玄《注》：“书名，书之字也，古曰名。”《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皇侃《义疏》引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仪礼·聘礼》：“百名以上属于策。”郑玄《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管子·君臣上》：“书同名，车同轨。”

“名”，《说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甲骨文作𠂔（合5118）、𠂔（合7269正）等，金文作𠂔（召伯簋），为会意字，会夜晚目不能见以口自名之意。后由“自名”义引申出“命名，取名”义。《南宮乎钟》：“兹名曰无昊钟。”陈澧《东塾读书记》：“未有文字，以声为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为事物之名，故文字谓之名也。”即文字尚未产生之前，用有声语言来称名事物，有了文字，便用文字来称名事物，如此一来，便用“名”来称谓“文字”。

（三）称“书”

《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传》：“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陆德明《释文》：“书者，文字。”《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者也。”成玄英《疏》：“书者，文字。”

“书”，《说文》：“书，箸也。从聿，者声。”金文作𠂔（格伯簋）、𠂔（颂簋）等，本义为书写。王筠《说文句读·聿部》：“书，书写其本义也，因而所写之字谓之书。”

（四）称“文字”

“文字”一词，始见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时所刊立的琅邪刻石（在山东诸城县东南150里处），该刻石有“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一语。后世遂常用“文字”一词来称谓汉字，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它既可以用来指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的整个体系，也可以用来指一个个的汉字。当然，我们今天所指文字不仅仅特指汉字，但是，通常情况下，一般汉字

4 古代语言文字学

学著作中，仍然用文字称谓汉字。

二 文字学简史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汉字学也不例外，下面就根据历史顺序，分为几个阶段，对汉字研究的历史做一简单的介绍。

（一）先秦时期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寿命最长的文字，迄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对汉字研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文字学之萌芽，决在秦以前。”根据文献记载，当时对汉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汉字起源的传说

关于汉字的起源，先秦时流传着“仓颉作书”和汉字起源于结绳的传说，这些传说在《周易》及后来的《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和《淮南子》等古籍上都有记载。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些传说皆不可信。关于这个问题，留待“汉字的起源和构形”一节再做详细讨论。

2. 汉字构造的分析

关于汉字结构的分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如：

“夫文，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

“故文，反正为乏。”（《左传·宣公十五年》）

“于文，皿虫为蛊。”（《左传·昭公元年》）

“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这些对汉字结构的分析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不一定符合汉字结构的本义，有些甚至是借助对文字结构的分析来阐述自己的见解或政治主张，但是，这些做法已经开了分析汉字结构的先河。这类说法，也成了后来文字结构的理论基础。

汉字学传统理论的核心“六书”也出现于先秦。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六书”是“六艺”之一，是当时向学生进行教育的一门课程。不过，《周礼》只提出了“六书”之名，没有说明其具体内容。其后汉代郑

玄注《周礼》引郑众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说：“《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三家说“六书”皆本《周礼》，除具体名目和顺序稍有差异外，实质并无差别。《周礼》所提“六书”与后来六书理论是否为一回事，目前还有不同看法，但也提不出否定的证据。考察《周礼》所提“六艺”，“六书”当属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因此，周代已能系统地分析汉字的结构，汉字形体结构的基本理论已初步建立。

3. 字书的编纂

《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25—26）亡六篇矣。”又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史籀篇》早已亡佚，今天已无法知其梗概。据班固所说，此书为“史官教学童书”，当属于识字课本。近代以来，关于《史籀篇》的作者和撰成时代，学者们提出过许多看法。但将《史籀篇》视为我国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已无争议。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有一批字书产生。《说文·叙》：“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将《仓颉》、《爰历》、《博学》合并，总名仍叫《仓颉篇》，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秦三仓”。这三部字书作于秦始皇统一之初，共收字 3300 个，大体包括了当时的常用字，可以说上承《史籀》，下启《急就》诸篇，影响深远。一方面满足了学童识字的需要，一方面作为当时“书同文字”的范本。

4. 汉字形体的规范整理

战国时代，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据《汉书·艺文志》：“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其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人用其私”，正如颜师古注：“各任私意而为字。”秦统一六国后，便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

《史记·秦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初并天下，“一法

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说文·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始皇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的一次系统的规范和整理。这次运动，将秦篆作为正字的标准字体，六国文字异形的历史基本宣告结束。除此之外，秦代还创立了隶书。《汉书·艺文志》：“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叙》也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隶书最初“起于官狱”，因为“施之于徒隶”，故而得名。简约易写的隶书与正规标准的小篆同时并存，说明了秦代规范整理汉字政策的灵活性。

汉字经过秦代的规范整理后，基本上走向定形，为后来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从西周到秦代，尽管汉字学理论还比较模糊，但是若干重要问题都有所涉及，因而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汉字学的萌芽期。

（二）两汉、魏晋时期对汉字的研究

经过周秦时期的萌芽，汉字学在两汉魏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特别是《说文解字》的问世，更是汉字学创立的重要标志。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对汉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古文经的发现

西汉初期，先秦古文已被废弃，隶书已甚通行，官方博士所讲授的儒家经学也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因而无所谓今文、古文之分。《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这些书籍都是用战国时代东方六国文字书写而成，从此就有了今文和古文的区分。古文经除了孔子旧宅壁中书外，还有民间所献，如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河间献王所得的《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鲁三老所献的《古孝经》等。古文经的发现，严重冲击了当时今文经学家以隶书解经的唯心主义观点，因而引起了今文经学派的严重不满，他们竭力发难古文字和古文经学，正如《说文·叙》所说：“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

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西汉前期，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五经皆列于学官，而古文经未列于学官，只在民间传授。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开始研究古文经，并建议将古文经列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学派的强烈抵制。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斗争由此展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论争自西汉末始，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前后长达二百余年之久。后来，郑玄等注解群经，走上综合“古”、“今”折中的道路，两派的斗争才宣告结束。在这场论争中，今文经学一直处于优势，古文经学直到东汉时期也没有得到正宗思想的地位。但是，古文经的发现，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让后世目睹了隶书之前汉字的真貌，也知道了汉字形体历经着发展演变这一客观事实。这场论争，也更加促进了汉字学本身的发展。

2. 字书的编纂

这一时期的字书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1) 继续“秦三仓”的系统

在西汉时期，有许多文字学家从事文字的收集整理工作，如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平帝时扬雄作《训纂篇》。可见，西汉时，在秦之《仓颉》、《爰历》、《博学》三字书之外，又先后出现《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四字书，合在一起，称为“仓颉七篇”。其他字书皆已亡佚，现在仅存《急就篇》一种。东汉时期，班固延续扬雄《训纂》十三章，合一百零二章，作成《续训纂》；和帝时贾鲂作《滂喜篇》。这些都是继续《仓颉》系统发展而来。后来，将秦之《仓颉》、《爰历》、《博学》三书合并为《仓颉篇》定为上卷，将扬雄的《训纂篇》定为中卷，将贾鲂的《滂喜篇》定为下卷，将此三卷统称为“三仓”。

(2) 形、音、义合解的《说文解字》系统

东汉时期，许慎在前人字书和六书理论的基础上，撰成了我国汉字学史上的不朽名著《说文解字》。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上书于安帝建光元年（121）。全书共分十四卷，分为五百四十部，共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字，每字都做了字形、字音、字义的解释和说明，连同解说共计十三万三千零四十一字。自《说文》开始，字书的编纂改变了过去识字课本式的体例，创造了从字体结构考察字音、字义的

新体系。该书体例严谨，博大精深，是一部实用性字书，也是一部系统性论著。段玉裁评价《说文》说：“无《说文解字》，则仓籀造字之精意，周孔传经之大旨，蕪緼不传于终古矣！”《说文》泽被后世，辉映千古，是汉语文字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著作。

魏晋时期小学类字书编著很多，《隋书·经籍志》载小学类有“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然大多数均亡佚无存。影响较大的，有西晋吕忱的《字林》和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

《字林》是承《说文》而编纂的一部字书，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晋有吕忱，更按群典，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所无者，是忱所益。”《字林》问世后，曾一度与《说文》齐名，广泛流传。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说：“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说文》）；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字林》）。”颜之推将吕忱与许慎相提并论，是将《字林》和《说文》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字林》早已亡佚，现有清人任大椿《字林考逸》八卷，凡一千五百余字；陶方琦辑《字林补逸》一卷，约二百字。两书合辑约相当于原书字数的百分之十五。

《玉篇》撰成于梁大同九年（543），是《说文》之后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字书，也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梁朝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清代朱彝尊《重刊〈玉篇〉·序》：“顾氏《玉篇》，本诸许氏，稍有升降损益。迨唐上元之末，处士孙强稍增多其字，既而释慧力撰象文，道士钊利正解疑，至宋陈彭年、吴锐、邱雍辈，又重修之，于是广益者众，而《玉篇》又非顾氏之旧矣。”今本《玉篇》已非顾野王原著，是宋代重修，并改名为《大广益会玉篇》。清朝末年，黎庶昌、罗振玉先后于日本发现了《玉篇》残卷，其引证丰富，释义完备，又有顾野王的按语，保存2100余字，仅为原书八分之一，价值弥足珍贵。《玉篇》沿袭《说文》体例，分部排列，只是《玉篇》共分542部，并对《说文》部首、次序进行了重新排列。《玉篇》的解说体例，也与《说文》不同。《玉篇》字头和解释均为楷书，每字下先注明反切，再解释字义，并未分析字的结构。《玉篇》释

义部分材料丰富，是一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和研究水平的字书，在汉字学史、训诂学史和字典编纂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 正字石经的镌刻

汉字经过秦代“书同文”的规范发展，隶书字形基本已定形，然而，社会上流传的俗体误字仍然长期存在，因此，东汉末年年开始，就有人提倡镌刻石经进行正字。镌刻石经开始于西汉末年王莽之时，然当时所刻石经早佚。现存最早刻立的石经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镌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当时书籍主要是竹简、手抄笔录，辗转相传，极易讹误，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针对这种情况，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塔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石经起到了统一书面语言文字的作用，也提高了全社会用字的规范意识。熹平石经只用隶书刻成，是一体石经。魏时曹芳正始二年（241），又刻立了《尚书》、《春秋》、《左传》三部石经。因为每字都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称“三体石经”。古文、小篆和隶书三体同步镌刻，相互参校，对于汉字的学习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惜这两处在刻立不久，就受到毁坏，现在仅存一些残石。根据统计，现存残石合计约有 2500 字。

（三）唐宋对汉字的研究

唐宋时期对汉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辨正文字“字样”书的编纂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的字体从隶书逐渐转变成了楷书。当时地方割据，社会动荡，文字的使用十分混乱，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唐朝建立后，为了纠正这种混乱状况，一系列辨析异俗、匡正讹误、统一字形的“字样”之书相继产生。

字样，即汉字楷书字的样本。颜师古的《字样》是“字样”之书的开创之作。唐太宗贞观年间秘书监颜师古在秘书省刊正经籍，校订字体，辨别讹误、录成样本，以便雠校时作为准绳，当时称之为《颜氏字样》。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字样之书相继问世，如唐代杜延业的《群书新定

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等；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张有的《复古编》、姜机的《广干禄字书》、李从周的《字通》等。

文字辨正的“字样”之学，是适应唐王朝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语文规范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久远的实践意义。

2. 对于《说文》的研究

《说文》问世后，深受学者推崇，然经世代流传，产生了不少错误；同时，对《说文》也仅停留在引用和增补阶段，《说文》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尚未开启。直到唐朝，《说文》的整理和研究才得以真正开始，这一时期对《说文》的研究和整理最有贡献者当数李阳冰和徐铉、徐锴二兄弟。宋代楼钥云：“许叔重著《说文解字》垂范千载，李阳冰中兴斯文于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学……至今赖之。”（《复古编·序》）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唐代文字学家、书法家。字少温，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徐铉《上〈说文〉表》说：“唐大历（766—779）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今古，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又说：“唐大历中，李阳冰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李阳冰以篆学得名，他根据篆学笔法刊定《说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说文》所作的全面整理。周祖谟先生在《李阳冰篆书考》里总结李阳冰刊定许书者，约有三方面：一是设定笔法，二是别立新解，三是刊定形声。李阳冰刊本今已不传，只有徐铉《说文》校语和徐锴《说文系传·祛妄篇》的一小部分说解，我们可以窥其梗概。自李阳冰刊定《说文》后，曾受到学者的推崇，然自二徐兄弟之后，对李氏又多排诋之词。在我们今天看来，李阳冰刊定《说文》的功绩和所立新义，应该有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姚孝遂在《许慎与〈说文解字〉》中指出：“自宋以来，普遍都认为李阳冰擅改《说文》，是《说文》的罪人。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胡朴安先生在《中国文字学史》中也说：“阳冰之说，虽不合于许慎之本书，或文字之原始，而亦有致疑之处，颇与学理相合。”

李阳冰之后，对《说文》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广陵二徐——徐铉、徐锴兄弟。徐锴（920—974），字楚金，仕于南唐，卒于南唐亡国前夕

(974)。徐锴撰《说文解字系传》（简称《说文系传》）四十卷，世称“小徐本”。卷一至卷三十为“通释”，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为“部叙”，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为“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凡是徐锴所发明及征引经传者，皆加“臣锴曰”或“臣锴按”以说明。根据周祖谟先生的《徐锴的〈说文〉学》研究，徐锴的《系传》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以许训解古书；二是说明古书的假借；三是说明古今字；四是说明引申义；五是兼举别义；六是辨声误（《问学集》）。《说文系传》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说文》的著作，徐锴也堪称文字学史上全面系统研究《说文》的第一人。

徐铉（917—992），字鼎臣，初仕南唐，后归于宋。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奉诏和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订《说文》，世称“大徐本”。“大徐本”对《说文》的主要贡献是“精加详校”，力求恢复其本来面貌。徐铉等人所作的校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补“漏落”；二是纠正时俗讹变；三是勘正《说文》流传之误。除进行了校订整理外，徐铉等还多有创获之处：一是附益新字，全书共新增402字，附于各部之后，并仿照《说文》对新增字加以解释，分析其结构；二是统一反切，以孙愐《唐韵》反切为据，随字注音，使《说文》之后各家注音得以统一；三是改易分卷，《说文》原书十五卷，徐铉将每卷分为上、下二卷，共为三十卷；四是增加注解，增加的注解一方面是引用李阳冰及弟徐锴之说，另一方面是徐铉等人的新说。

二徐的校订和研究对《说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宋已降，《说文》之传世者，唯大、小徐二本。因而，二徐对《说文》的研究可以说承前启后，功绩卓著。清代《说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直接得益于二徐。

3. 金石学的建立

金石学建立于宋代，是以青铜器及其铭文与石刻为对象的专门学问，是考古学的前身。

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早在汉代即有出土。《说文·叙》：“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但是由于当时出土的青铜器和石刻较少，所以时人重视不够。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发现了石鼓文，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

代几经周折，才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今原石已佚，仿鼓现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时至宋代，因为盗掘古冢行为日甚，商周铜器不断出土，开始引起了学界的重视，金石之学兴起。金石学的创始之功，当首推刘敞、欧阳修二人。宋代赵明诚说：“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刘敞），而集录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欧阳修）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石，皆二公之力也。”（《金石录》卷十二《谷口铜甬铭跋尾》）刘敞作《先秦古器图》，收录了11器，附有图录、铭文、说赞，属于较早的著录铜器的著作。欧阳修所编《集古录》，则是标志金石学建立的标志性著作。有宋一代，可以说金石学盛极一时。金石学的著作根据内容和体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摹写著录器物和铭文的，代表性著作有吕大临的《考古图》和宋徽宗敕撰、王黼编纂的《博古图录》；二是专门考释铭文的，代表性著作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三是专论和跋语，主要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和翟耆年的《籀史》等；四是集录考释文字成果的，如吕大临的《考古图释文》、王楚的《钟鼎篆韵》、薛尚功的《广钟鼎篆韵》等。

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在汉语文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保存、传播了一大批古文字资料，为后世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保证；另一方面，开始了对金石文字的全面研究，突破了汉字学主要研究小篆的传统，以出土文献文字为研究对象，加深了人们对汉字发展历史的认识。

据申小龙的观点，中国古代的文字学，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说文》之学，正字之学和古文字学。而说文学又分为三个方面，《说文》系字书；对《说文》的校勘、注释和研究；六书理论的研究。从上文所列宋代文字书目表来看，《说文》系字书，以王洙等《类篇》为代表；对《说文》的校勘、注释和研究，以大徐本《说文解字》为代表；正字之学，以《佩麟》、《广干禄字书》为代表；六书学，以郑樵《六书略》为代表；古文字学，以《汗简》、《古文四声韵》为代表。可以说，唐宋所有的文字学类别全都具备。